从邺城到晋阳

——古壶关道上一座被盗北齐石窟的复原

李裕群

内容提要　东魏北齐时期，沟通邺城与晋阳的滏口道既承担着交通往来的重要作用，又与佛教文化艺术传播密切相关。滏口道上分布着许多东魏北齐时期重要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本文所述的古壶关道是滏口道南线上的交通咽喉，重要的石窟寺有北齐开凿的黎城白岩寺石窟和下湾响堂寺石窟。其中白岩寺石窟原有保存较好的九尊造像，不幸于1999年惨遭盗割，无一幸存。本文根据被盗前的影像资料进行了复原研究，并就造像题材作了考释。同时，论述了白岩寺石窟在洞窟形制、造像题材与造像样式方面同都城地区石窟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古壶关道　北齐时代　白岩寺石窟　造像复原

一　引言

东魏北齐时期，从邺城到晋阳，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滏口道，即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向西北行，经滏口分为东西两线，分别穿越太行山脉。东线经涉县向西北行，过黄泽岭、辽阳（今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平都城（今晋中市和顺县仪城村），越八赋岭，抵达太原（今太原市晋源区）；西线由涉县向西，越古壶关口，抵黎城（即古壶关道）、襄垣、武乡，再北上太原。西线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古壶关道上现存北齐石窟一座，为白岩寺石窟〔图一〕。白岩山属太行山脉腹地，又称蟒山，位居古壶关口之西，距离河北涉县以及邺城很近。

白岩寺石窟位于黎城县洪井镇元村北约2千米的白岩山近山顶处，北纬36°33’80.8”，东经113°24’28.1”，海拔1075米。从县城出发东北行，沿着盘山古道步行即可到达。白岩山东西绵延，山巅略显平坦。洞窟开凿在几近垂直的石灰岩质的南向崖面上，前临悬崖，窟前地面狭窄。倚此俯视白岩山麓，便可看到白岩寺遗址。寺院创建于唐武德二年（619）[1]，遗址中还保存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之遗物，现已重建寺院。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黎城县志》卷一“山川条”记载：“白岩山在县北十五里。岩在山（疑为寺字）废，本名朱喙岩……《明一统志》云：齐武帝（高欢）与尔朱荣统众北望。帝指其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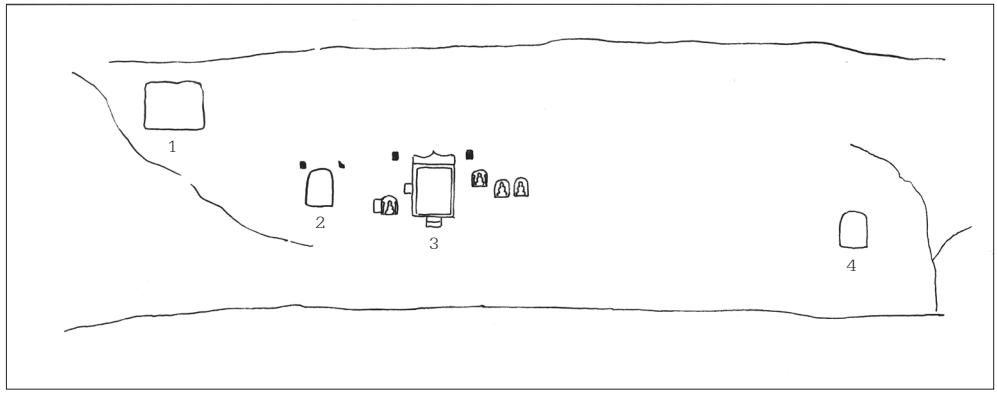
‹1›　清康熙《黎城县志》卷二寺观条记载：“白岩寺在县北十五里白岩山麓，唐武德二年建。”

此是天蟒口开赤色，主杀人可塞之。居人遂涂以石灰，因号白岩。”此为黎城八景之一“白岩晓烟”。白岩寺石窟现存洞窟4座，小龛4个，均坐北朝南〔图二〕。窟群之东为大型敞口式岩洞。洞窟由西而东编号，只有第3窟保存有完整的北齐造像，第1窟窟内北壁和东壁坛上各凿出一佛像石胎，似为北朝洞窟，其他两窟均为明洪武年间开凿的“岩公堂”[1]。不幸的是，1999年岁末，第3窟惨遭不法分子盗割，窟内造像无一幸免。2000年，黎城县文化局募资依样重新雕刻佛像，嵌入窟内各壁，立碑以记之〔图三〕。盗割的痕迹已被掩盖。由于所请工匠并不理解原造像具有的时代特征，故新雕之像已失真，且东西壁造像亦互相颠倒混淆。2006年9月，笔者与美国学者衣丽都女士曾翻山越岭到达目的地考察，面对窟内惨状和新作样式，颇感痛心。近年来，笔者整理山西北朝石窟寺资料，深感该石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经征询，黎城县文广新局局长王苏陵先生为我们提供了2016年内部刊印的《千年遗珠白岩寺》一书[2]，并联系到曾经调查过白岩寺石窟的原黎城县文化馆老馆长赵满芳。赵馆长慷慨地将他1976年8月拍摄的石窟被

〔图一〕黎城白岩寺石窟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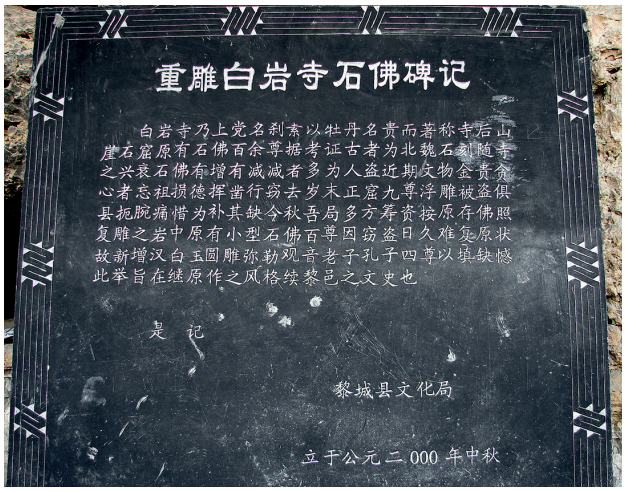
〔图二〕黎城白岩寺石窟立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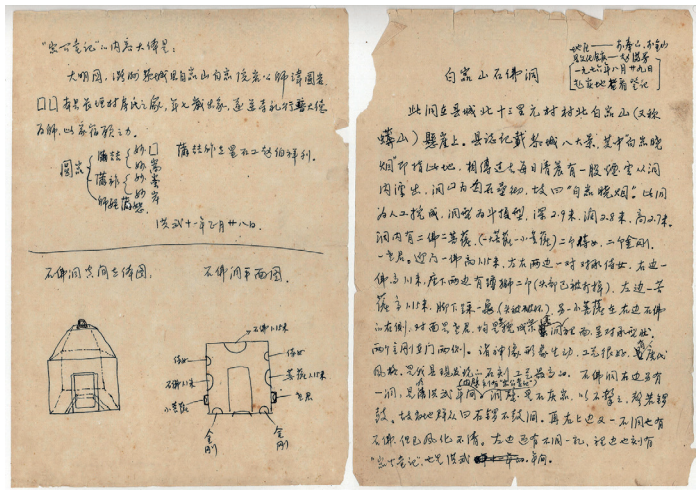
‹1› 第2窟为方形，券顶，面宽和进深均1.1米，高1.4米。正壁有一壁龛，龛内原有一尊造像。窟内东壁有明“洪武贰拾二年(1389)”镌刻的《岩公堂记》，岩公即圆岩，叙称：“山西潞州黎城县白岩寺崇福院”圆岩和尚七岁出家等事迹，铭文曰：“代闻心源湛寂，法海润泽，迷之者永……”可知此窟为明代开凿，可能属于影窟。第3窟分为前后室，前室宽0.80米，进深99米，高0.96米；后室高宽与前室相当，进深0.95米。前室东壁镌刻《岩公堂记》内容较第2窟简略。“潞州黎城县白山……师讳圆□……房氏……遂送寺礼符……大德为师，此乃宿愿之力……洪武贰拾二年正月廿日。”知为同时开凿。

‹2› 王苏陵编著《千年遗珠白岩寺》，黎城县文化局，2016年。该书主要对白岩寺出土的遗物和白岩寺石窟做了简单的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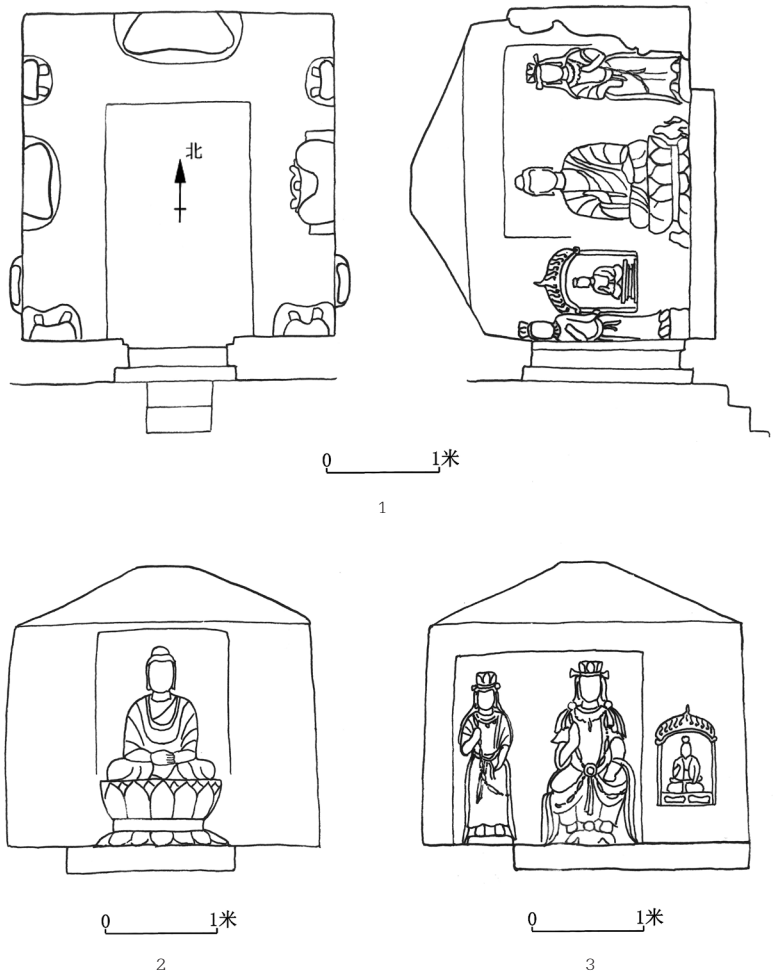
〔图三〕《重雕白岩寺石佛碑记》



〔图四〕1976年调查记录



〔图五〕黎城白岩寺第3窟线图
1. 平剖面图　2. 北壁　3. 东壁



盗前的图片和简单的调查记录一并提供给笔者〔图四〕，使我们得知洞窟造像的原貌，也为将来追索造像的下落提供有力的证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　洞窟现状与造像复原

第3窟平面方形，覆斗顶。面宽2.80米，进深2.90米，高2.72米〔图五〕。窟门长方形，面宽0.93米，进深0.20米，高1.30米。有尖拱门楣，门前有二级踏道，由此可进入窟内。窟门外两侧上方各有一长方形梁孔，应是木构窟檐遗迹〔图六〕。窟门外西侧崖面镌刻有发愿文，共五行，现可辨："大齐武平六年(575)八／月十五日比丘□／……"等字〔图七〕。

窟内三壁微微内倾，壁前设低坛基，高0.20米。正壁坛基宽0.79米，侧壁宽0.74米。坛上原雕有造像9尊，2000年重雕后，将东西壁造像完全颠倒，现根据窟内破坏前的原状图片和文字记录，可进行复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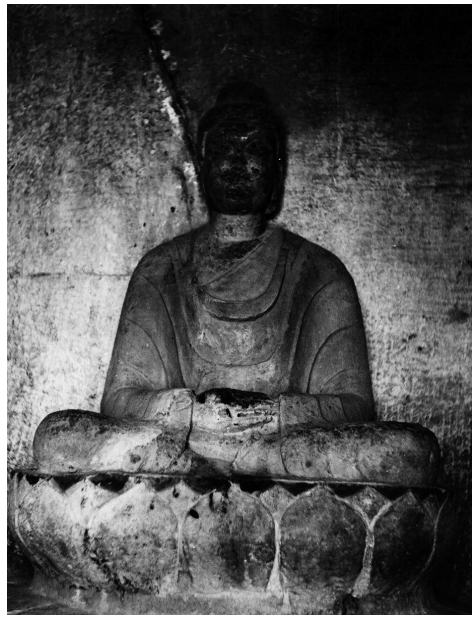
〔图六〕第3窟外观



〔图七〕第3窟窟门西侧纪年题记



〔图八〕第3窟北壁坐佛原状



〔图九〕第3窟北壁重雕佛像



（北）壁雕一坐佛；东壁为倚坐菩萨和北侧胁侍菩萨立像；西壁为一坐佛和北侧胁侍菩萨立像。东西壁的南侧各凿一龛。前壁窟门两侧各雕一力士像。

正壁佛像，高1.15米〔图八，图九〕。原佛头顶有高大的肉髻，素面发式。面相长圆，弯眉长眼，鼻尖稍残，嘴宽窄适中，嘴下雕出下颌线。颈部略短，上有两道肉纹线。双肩圆润，身体健壮。身着开口较低的通肩大衣，衣纹疏朗，胸口露出僧祇支。双手置于腹前，前后相叠，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仰覆莲均为单瓣。现佛像改为双手捧宝珠样式，身体明显变宽。

东壁倚坐菩萨，坐高约1.4米〔图十，图十一〕。原菩萨像头戴三摩尼宝珠冠，头两侧扎下垂及肩的宝缯，面相长圆，眉眼上挑，鼻和下颌稍残，颈部略长，颈下佩戴华丽而复杂的项圈，双肩上各有一圆饼装饰，连缀着璎珞。璎珞呈“X”形交接于腹部圆形饰物上，下垂于腿部后绕向身后。披巾从双肩搭下亦交接于腹部，绕双腿后上搭双肘，再沿身侧下垂及地。上身斜披僧祇支，下身着裙，腹饰裙腰，中部有双带垂下。菩萨身体宽厚，右手上举，左手置于左腿上，均戴双环手镯。双腿自然下垂，倚坐于方座上，露足，足下有半身地神像，地神从地下涌出，头已毁，双臂张开。现倚坐菩萨置于西壁，身体臃肿，项圈亦不按照原样雕造。且修复工匠并不认识足下之地神像，从而将其改雕为足下各踩一覆莲座样式。

北侧胁侍菩萨立像，高约1.3米〔图十二〕。原菩萨像头戴火焰宝珠冠，冠两侧扎下垂及肩的宝缯，发髻中有分叉。面相长圆，弯眉长眼，鼻嘴稍残，长耳。颈部略长，颈下戴圆环形项圈，项圈下垂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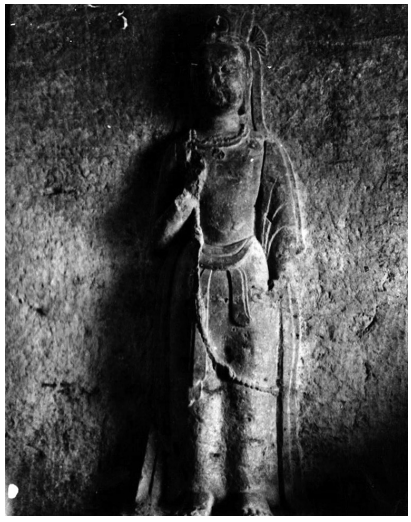
〔图十〕第3窟东壁倚坐菩萨原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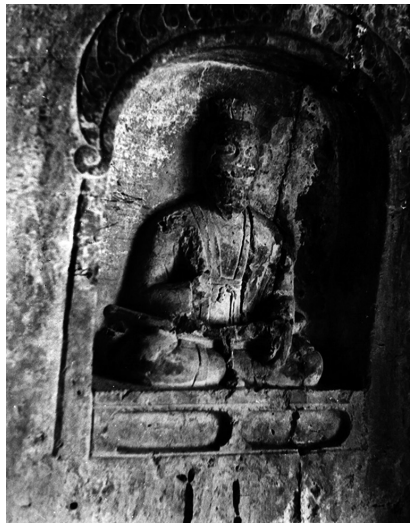
〔图十一〕第3窟原东壁造像，重雕后置于西壁



〔图十二〕第3窟东壁菩萨立像原状



〔图十三〕第3窟东壁南龛造像



〔图十四〕第3窟原东壁龛内造像，重雕后置于西壁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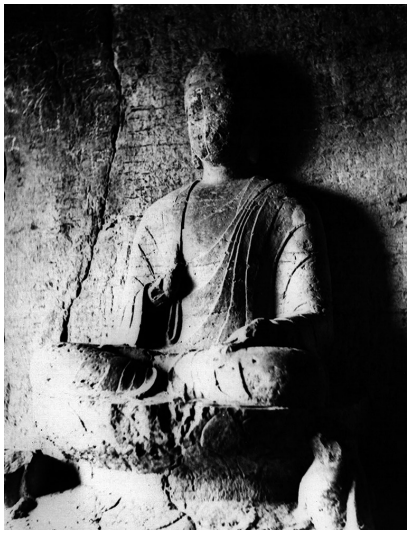


挂饰，上有一串联珠纹。双肩敷搭披巾，披巾沿身侧下垂及地。一道璎珞从右肩斜披至左膝处。璎珞由穗状和联珠纹构成。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腹饰裙腰，裙腰系系带。右手上举，左臂下垂，手残，从残迹看手似作勾手状。露双足，立于覆莲座上。现菩萨像增补了左手。

南侧凿有一圆拱形小龛，高0.54米，宽0.45米，深0.10米〔图十三，图十四〕。有龛梁和尖拱龛楣，楣面雕刻火焰纹，龛梁尾作卷圆头，龛两侧为方形龛柱。龛内原雕一尊坐像，头戴高冠，面相长圆，长须髯，身着对襟长袍，内衣中系带，衣纹简洁。身体宽厚，右臂上举，手残，左手下垂，搭在三足凭几上，凭几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龛内带有两个壶门的方形榻上，其形象似道教老君像。现头像改为头戴三叶宝冠，下颌去掉了长须髯，腹前的三足凭几错误地改为一粗圆圈。

西壁坐佛，高1.1米〔图十五，图十六〕。原佛像为高肉髻，脸庞长圆，五官斑驳，长耳。身着双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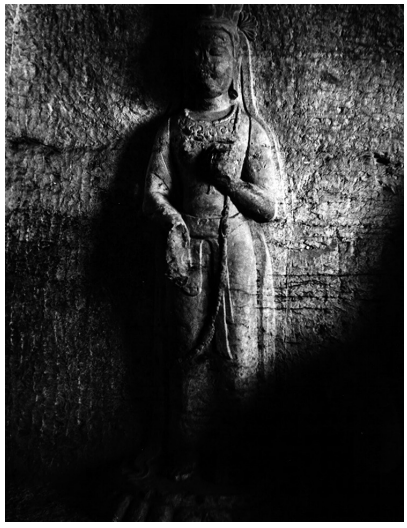
〔图十五〕第3窟西壁佛像原状



〔图十六〕第3窟原西壁龛造像，重雕后置于东壁



〔图十七〕第3窟西壁菩萨立像原状



〔图十八〕第3窟西壁南龛原状



〔图十九〕第3窟原西壁南龛菩萨，重雕后置于东壁



下垂式大衣，内着僧祇支，露左足，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仰覆莲为单瓣，座两侧各有一蹲狮。左侧狮子保存较好，昂首作仰望状，狮尾上卷。右侧狮头已缺失。现佛像雕出清晰的五官，增加了莲座之仰莲和佛座右侧狮子头。

北侧胁侍菩萨立像，高约1.3米〔图十七〕。原菩萨头戴三宝珠冠，扎宝缯，缯带下垂于肩外两侧，面相长圆，弯眉长眼，鼻和嘴略有残缺，颈部粗细适中，颈下戴联珠纹项饰，项饰垂挂三朵花饰。双肩敷搭披巾，披巾沿身侧下垂及地。左肩一道璎珞斜披至右膝处。璎珞样式同左壁菩萨。菩萨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裙腰外翻，束带。左手上举，右臂下垂，手残。露双足，立于覆莲座上。现菩萨像手势、系带与原作相反，其错误的原因大概是原照底片洗印时弄反所致。

南侧凿一圆拱形小龛，龛形大小同东壁。龛内原雕一尊菩萨坐像〔图十八，图十九〕。头戴三宝珠

〔图二十〕第3窟南壁东侧力士原状



〔图二十一〕第3窟重雕后南壁东侧力士像



〔图二十二〕第3窟南壁西侧力士原状



〔图二十三〕第3窟重雕后南壁西侧力士像



冠，无宝缯。面相长圆，五官风化。颈下戴联珠纹项圈，项圈下垂花饰。双肩宽平，披巾从双肩沿身侧下垂。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裙腰外翻，束带。右手上举，左手置于左腿上，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现菩萨像修补面部和双手，缩小了须弥座。

前壁东侧力士〔图二十，图二十一〕，原力士头冠已残，面朝窟门，额际有三道皱纹，圆目怒睁，塌鼻，嘴角下撇。双肩宽厚，披巾从双肩搭下，沿身侧下垂及地。身体倾斜，提臀，明显扭动。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腹饰裙腰，系双带。露双足，踩山形座上。现力士作微侧脸，面朝窟内，增补双手，足下改为长方形座。

西侧力士〔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原力士头戴三宝珠冠，面相长圆，眉毛上挑，圆目怒睁，宽鼻，嘴角下撇。颈部青筋突起，双肩耸起，披巾沿身侧下垂，肌体圆润，上身袒露，下身着裙。露双足，踩山形座上。现力士增补左手，双足及座为原物。

窟门外两侧崖面雕有圆拱龛四个，第1龛位于洞窟西侧，其余3龛在洞窟东侧。

第1龛，高0.33米，宽0.32米，深0.12米〔图二十四〕。圆拱形，无龛楣和龛柱。龛外西侧有题记〔图二十五〕，共六行，每行八字：“大齐武平六年八月／廿日比丘德□□□／释迦佛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为父母／师僧□□□□□□／□□□□一时成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像面残，颈粗短，双肩宽厚，身着通肩大衣，领口略低，胸部露出僧祇支，裙摆短，衣纹疏朗。双手置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仰覆莲均为单瓣。两侧菩萨头残，双肩敷搭披巾，披巾沿身侧下垂及座，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双手合十，露足，立于仰莲台上，莲台下有莲茎和忍冬纹，与佛座相连。

第2龛，高0.28米，宽0.22米，深0.09米〔图二十六〕。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佛像面残，身着通肩大衣，裙摆短，衣纹疏朗。双手置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单瓣仰覆莲座上。两侧弟子头均残，身披大衣，双手合十，立于仰莲台上，莲台下有莲茎和忍冬纹，与佛座相连。

第3龛，高0.23米，宽0.18米，深0.09米；第4龛，高0.26米，宽0.18米，深0.09米。龛内均雕一坐佛。

佛头残，身着通肩大衣，双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单瓣仰覆莲座上。

三　洞窟形制与题材样式

白岩寺第3窟开凿于北齐武平六年（575），由比丘主持开凿。洞窟形制呈方形、覆斗顶，三壁设坛式。方形、三壁设坛式主要见于北齐开凿的邯郸南响堂第4、6窟‹1›，安阳小南海中窟、东窟和西窟‹2›，以及涉县林旺石窟‹3›，窟顶以平顶为主，覆斗顶少见。同时期的太原天龙山石窟则不相同，流行三壁三龛制。不过，受邺城石窟的影响，在山西北齐中小型石窟中开始流行方形、三壁设坛式。覆斗顶是山西北朝石窟寺固有的形制，早在北魏时期即已流行，如武乡良侯店石窟‹4›、高平羊头山石窟‹5›、左权石佛寺石窟等‹6›，都是如此。到东魏北齐时期更为流行，如太原天龙山石窟第2、3窟，第1、10窟等‹7›。由此可知，

〔图二十四〕第1龛



〔图二十五〕第1龛西侧纪年题记



〔图二十六〕第2-4龛



‹1›　参见[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第十九图，第四洞测图；第二十三图，第六洞测图。

‹2›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第1－14页，图二五，小南海西窟平面图；图三六，小南海中窟平面图；图三八，小南海东窟平面图。

‹3›　参见赵立春《河北涉县林旺隋代石窟调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52页，图3。该窟开凿于北齐，隋开皇七年（587）续凿完成。

‹4›　李裕群《山西北朝时期小型石窟的调查与研究》，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7－60页，图2.1，良侯店石窟平剖面图。

‹5›　张庆捷、李裕群、郭一峰《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第63－88页。

‹6›　李裕群《左权石佛寺石窟与"高欢云洞"石窟》，《文物》1995年第9期，第58－70页，图三，石佛寺第1窟平剖面图。近来在窟顶发现发愿文，知为北魏孝昌二年（526）开凿。

‹7›　参见李裕群、李钢《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图五、一〇、一四、四九。

〔图二十七〕成都龙泉驿石窟北周强独乐造文王佛道龛碑



白岩寺石窟兼有邺城和山西北朝洞窟的特点。

第3窟主尊造像题材为三佛，正壁和西壁为结跏趺坐佛，东壁为倚坐菩萨，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佛。其中东西壁北侧二菩萨像应为正壁释迦佛之胁侍。比较特殊的是东壁倚坐菩萨，这种形象并不见于由北齐皇室主导开凿的邺城响堂山石窟和太原天龙山石窟，但在山西北齐至隋中小型石窟中极为常见，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其身份可以确定为表现未来世之弥勒[1]。但东西壁前侧两小龛的造像，却耐人寻味。西壁龛内雕菩萨坐像，与此对应的东壁龛内造像则为形似道教的老君像。如果此造像在单独洞窟中出现，其形象无疑是道教像，但道教造像出现在比丘所开凿的洞窟中，则疑问重重，似乎难于解读。我们知道：在道教发达的四川地区佛道合龛的现象较为常见，如四川成都龙泉驿大佛岩北周强独乐造像龛是年代最早的实例。包括了北周文王碑（第38号）及龛像（第34号）[2]。碑文上部题："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树其碑，元年岁次丁丑造。"即北周孝闵帝元年（557）雕造。碑铭记载："……（强独）乐等今从柱国大将军大都督甘州诸军事化政郡开国公宇文贵，边戍岷蜀，因防武康，不胜悲切，故于□东之岭，显益之，天落石傍，为王敬造佛道二尊宝堂，药王在其左，普贤在其右，文殊师利侠持两箱……"造像龛（第34号）内雕释迦、老君二主尊，左右并列，两侧分别有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女侍二真人作胁侍〔图二十七〕。由此可知，佛道处于同等的地位。而白岩寺石窟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何况佛道合龛也不见于北齐石窟中，那么，由比丘主导开凿的洞窟内出现道教造像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该像是维摩诘的可能性更大些。参考太原天龙山石窟东魏时期开凿的第3窟，维摩诘和文殊菩萨分别位于东西壁前侧〔图二十八，图二十九〕[3]，位置与白岩寺石窟相同。维摩诘左手抚凭几，右手持麈尾，坐于带有壶门的榻上，其形象与白岩寺石窟也有相似之处，如此，将白岩寺石窟对应两龛的

‹1› 关于倚坐菩萨为弥勒的论述，可参见李裕群《从邺城到晋阳——古代交通路线上的北齐石窟》，未刊稿。

‹2› 参见温玉成、张雪芬、刘雨茂《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中原文物》2016年第2期，第89—93页。

‹3› 参见［日］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东京：金尾文渊堂，1922年，图版22、23；清晰的图片，可参见［日］岩田秀则《天龙山石窟图集》，未正式出版，1923年，图版26、32。

题材分别认定为维摩诘和文殊菩萨，似为更加合理的解释。

在造像样式方面，佛和菩萨均为肌体圆润，肩宽体壮样式。佛像的双领下垂式大衣、圆形仰覆莲座均为邺城响堂山北齐洞窟新出现的造像特征〔图三十〕[1]。菩萨像双肩披巾沿身侧下垂、肩上斜披一道璎珞至腿部的做法，也与响堂山石窟菩萨像一致〔图三十一〕[2]。由此看来，僧人在雕刻造像时参考了来自邺城地区石窟造像的粉本。

〔图二十八〕天龙山第3窟东壁南侧维摩诘
采自［日］岩田秀则《天龙山石窟图像》，图版26



〔图二十九〕天龙山第3窟西壁南侧文殊菩萨像
采自［日］平田悌《天龙山石窟》，图版19



四　古壶关道与北朝石窟

古代交通路线具有沟通都市、传播文化的属性，古壶关道亦同样如此。对此，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篇肆壹“太行滏口壶关道”有详细的考证[3]，此不赘述。黎城在古壶关道上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黎城，古黎国，两汉、晋属上党郡。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太武帝诛杀

〔图三十〕南响堂第1窟中心柱正壁龛佛像



〔图三十一〕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龛菩萨像



‹1›　参见［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第五辑，东京：法藏馆，1940年，图版100，北响堂中洞主尊佛像；图版109，南响堂第1窟中心柱正壁龛主尊佛像。

‹2›　参见前揭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第五辑，图版104，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壁龛主尊佛像和胁侍菩萨。

‹3›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太行滏口壶关道”，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6年，第1423页，图十九。近来段彬《东魏北齐时代的并邺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6卷第1辑，第90－97页)也有论述，可参考。不过该文所述滏口东线(即本文所述北道)之松门岭和武军驿应该在西线(南道)上。按《隋书・地理志》黎城县有松门岭。《太平寰宇记》卷四五“襄垣县”引《冀州图经》：“松门岭在襄垣北一百三十里，道通太原驿路。”《冀州图经》早佚，从内容看大概为初唐人所撰，黎城、襄垣东西相连，或与县界变化有关，但松门岭并非属于辽阳之地。

潞州叛民二千余家，改称刈陵，属襄垣郡[1]。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名黎城，属上党郡[2]。县治在今黎城县北4公里黎侯镇古县村。古壶关位居古县村之东。郦道元《水经注》卷一〇浊漳水条："漳水迳壶关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城北，故黎国也，有黎亭。县有壶口关，故曰壶关矣。"[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潞州黎城县条明确指出："古壶关，在县东二十五里。"[4]清康熙《黎城县志》卷一山川条的记载更为明了："壶口故关，东逾东阳五里，今吾尔峪也。"吾尔峪也称吴儿谷[5]，即今东阳关镇之东五里。"壶口故关"是为黎城八景之一，是太行山东西通道上的咽喉要隘，其东连涉县、邺城，西接襄垣，与洛阳太原驿道相连。今青兰高速(G22)亦路由此道。《北史》卷六《齐本纪上》记载："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路逢尔朱荣妻乡郡长公主自洛阳来，马三百匹，尽夺易之。(尔朱)兆闻……于是自追神武，至襄垣。会漳水暴长，桥坏，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初，魏真君中，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云在壶关大王山。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累石三封，斩其北凤凰山以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将出滏口，倍加约束，纤毫之物，不听侵犯。"[6]此事发生在洛阳至晋阳之道上，尔朱兆追高欢至襄垣。事后，高欢便由襄垣东出滏口，虽然文献中没有具体描述高欢的行军路线，但向东必然经过黎城，过古壶关，以达滏口。由此可知，襄垣是洛阳并州道与邺城并州道的交汇处，古壶关道则是并邺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这一交通干道上还设有驿站，如《北史》卷五五《唐邕传》记载，唐邕"从武成幸晋阳，帝至武军驿，因醉责虞候都督范洪，将杀之"[7]。武军驿即是《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襄垣郡刈陵县条所记：刈陵"有伏牛山、黎城、三垄山、积布山、潞城、武军城、涉城"的武军城[8]。

并邺之间频繁的交通往来，促进了这一地区佛教文化的交流和石窟寺的开凿。在这一交通路线上发现的北朝时期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比较重要的有东阳关镇下湾村响堂寺石窟。响堂寺石窟位于古壶

‹1›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所记："襄垣郡，建义元年(528年)置，治襄垣城。领县四……刈陵，二汉、晋曰潞，属上党，真君十一年改，后属。"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8—2469页。太武帝诛杀潞州民一事见《魏书》卷四《太武帝纪》记载：太平真君九年二月"遂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又斩其北凤皇山南足以断之。"第102页。

‹2› 《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上党郡黎城县条"记载："黎城，后魏以潞县被诛遗人置(刈陵)，(开皇)十八年改名黎城。有积布山、松门岭。"中华书局，1973年，第849页。

‹3›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3页。

‹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420页。《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纪十》将此事系于梁中大通二年(530)，中华书局，1956年，第4795—4796页。

‹5› 前揭《资治通鉴》卷二八〇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记载，卢龙节度使、北平王赵德钧将兵就是从"乃自吴儿谷趋潞州"。胡三省注"吴儿谷在潞州黎城县东北，涉县西南"。中华书局，1956年，第9195页。

‹6› 《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214页。

‹7› 前揭《北史》，第2002页。

‹8› 前揭《魏书》，第2469页。

关之东的驿道旁，其东与河北涉县响堂铺村相接，开凿于北齐时代。洞窟平面方形，攒尖顶，三壁设坛式。窟面宽1.80米，进深2.00米，高1.90米。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洞窟外立面雕刻成单层覆钵式塔〔图三十二〕，明显承袭了响堂山石窟的做法‹1›。窟内三壁坛基上各雕一铺七身像，主尊坐佛均毁，两侧各有三个圆孔，用于安插圆雕胁侍像，知原造像为雕刻完成后插入孔中。参考北响堂南洞三壁龛内各雕一铺七身，即一佛二弟子二缘觉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的做法‹2›，此洞窟造像组合中应当包含了大螺髻的缘觉像。这种题材组合的一致性，表明了创作的来源是北响堂南洞。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该窟坛基正壁前雕出一大壶门，可见雕刻造型复杂的博山炉〔图三十三〕，两侧坛基各有二个壶门，内各雕二神王〔图三十四〕。这种坛基壶门内雕刻神王的做法也是响堂山石窟的特色，显然，邺城石窟的影响很大。下湾石窟之北还有小门摩崖造像，位于东阳关镇长宁村小门自然村附近，共有11龛，其中保存了北齐天统五年(569)造像龛。由此可见，古壶关道在石窟造像艺术的传播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盛　洁）

〔图三十二〕黎城下湾响堂寺石窟外观



〔图三十三〕黎城下湾石窟正壁坛基博山炉



〔图三十四〕黎城下湾石窟西壁坛基神王像



‹1›　南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无论是塔庙窟，还是三壁三龛窟，其外观均雕刻成覆钵式佛塔样式。白岩寺石窟则是邺城地区以外所见到的唯一例子。

‹2›　参见前揭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图三十七。